

中華佛教寺院名勝大典

趙樣初

上海卷

总主编

肖武男

执行副总主编

李采芹

副总主编

濮文起 黄夏年 毛文涛 李 进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

总 主 编 肖武男

执行副总主编 李采芹

副 总 主 编 濮文起 黄夏年 毛文涛 李 进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 上海卷 / 总主编肖武男.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78-1237-2

I. ①中… II. ①总… III. ①佛教-寺庙-介绍-上海市

IV. ①B9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2238号

书名题字为集赵朴初书法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200235)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89×1194 1/12 印张 48.5 字数 1 200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8-1237-2/TU·153

定价: 58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分别介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的佛教寺院，是集佛教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文物古迹等于一体的鸿篇巨著。是自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问世 1 460 余年来，第一次集中编纂的全国佛教寺院通志，填补了一项历史文化空白。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上海卷是其中之一，主要介绍上海市现在开放的 107 座寺院（含居士林、烧香点）和现存的 45 座塔、幢以及 2 900 余座湮没寺院，对于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上海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佛教建筑，让世人全面认知上海，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上海卷分为六个部分：全国重点寺院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区重点及特色开放寺院；其他开放寺院；现存佛塔、经幢；湮没寺院；附录。

佛國莊嚴
聖境增輝
一誠



一誠，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现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北京市法源寺方丈。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顾问和总主编、副总主编

顾 问 一 诚

黄心川 方立天 楼宇烈 杨曾文

总 主 编 肖武男

执行副总主编 李采芹

副 总 主 编 濮文起 黄夏年 毛文涛 李 进

《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编辑部

主 任 徐耀标 周建国

副 主 任 李 刚 杨潮幸

总 编 辑 李采芹

副总编辑 魏晓峰 金易明 王 瑚

编 辑 胡 毅 楼玲玲 李 俊 刘文奎

王炎龙 祁国辉 沈晓平 赵 军

兰明娟 万竹莽

缘起

自两汉之际，佛教首传东土，悠悠 2 000 余年，中国已成为佛教流传之大国。浩浩华夏大地，遍布琳宇梵宫。中华名山古刹，犹如昊天繁星，撒落大江南北。为数几何，历代高僧大德和学者名士，孜孜以求，竟未可得。

自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杨衒之编著《洛阳伽蓝记》问世 1 460 多年来，虽记述佛教寺院志书不断刻印流传，但均为个人、寺院或名山、或地区自行编纂，而且仅限于部分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从已有寺院志书来看，主要是汉传佛教，涉及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志书很少，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今佛教寺院的煌煌大著，这对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承继与发展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寺院作为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仅承载着中国佛教之历史沧桑，而且成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浩荡不竭的佛教文化源泉，成为东方智慧的结晶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此外，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物化形式，寺院的荣辱兴衰、屡建屡毁，也反映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

中国佛教，无论汉传、藏传还是南传，历经 2 000 余年经久不衰，佛教寺院俨然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在历代方志、图志、游记、风土记等史籍中，佛教寺院详尽罗列其中，尤其是佛教寺塔大多成为一个地理区域重要的文化标志。大量历史文献记载表明，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建筑大多毁于包括战火在内的火灾，火灾是佛教寺院屡建屡毁的主要原因，并成为突出的历史现象。1996 年出版的《中国火灾大典》¹ 收录历代佛教寺院火灾多达 4 000 余条，火灾成了佛教寺院的大敌，总结这方面经验教训显然很有必要。当今的佛教寺院，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就是公众聚集场所，一般都列入消防重点保护名单，佛教寺院与消防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化高度自信、自觉的国家。当今，在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节点上，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等同仁经多年酝酿，提出了编纂出版《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的设想。

编纂《大典》筹建工作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热忱支持。2008 年，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和蒋坚永副局长对《大典》编纂出版曾提出要求；2009 年 12 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立项，

¹ 《中国火灾大典》（三卷），由李采芹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缘起

并履行出版选题报批手续；2010年2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全面启动组稿；2010年6月21日，《大典》编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编纂《大典》是一项前无古人、浩大的文化梳理、研究、结集工程。《大典》的定位是一部了解中华佛教寺院的工具书，一部纵览全球中华佛教寺院名胜的文化通志。《大典》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集中地区分别设卷，收录古今寺院的条目约10万条。如此浩繁卷帙，开创了同类图书的历史记录。

这是一项“横观八万里，纵览二千年”的佛教寺院系统性存录工程。从横向的地理涵盖上看，《大典》收入的佛教寺院，遍及世界多地；从纵向的历史脉络看，《大典》收集、盘点历朝历代的寺院，并对那些湮灭的寺院名迹竭力做到存名留史。

人类的文明始终是和建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座寺院的兴衰就是一座寺院的历史，把众多的寺院变迁串联在一起，就形成了最生动、最翔实、最为绚丽多彩的中国佛教史长卷。这项学术研究成果，对弘扬佛教文化，为中华民族传承和延续一份悠久而弥珍的历史文化遗产功莫大焉！

凡 例

- 一、《中华佛教寺院名胜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的编纂,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力求全面、客观地记述各地佛教寺院的历史和现状。
- 二、《大典》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人集中地区分别设卷。各卷秩序不分先后。寺院多的地区,可一卷多册;寺院少的地区,可多卷合为一册。
- 三、《大典》正文条目基本分五个部分:全国重点寺院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及特色开放寺院;其他开放寺院;现存佛塔、经幢;湮没寺院。每个部分以寺院、塔幢名称为条目,一寺(塔幢)一条,每条字数不限,有事则多,无事则少,不求一致。
- 四、《大典》收录佛教寺院的时间上限,大体按佛教传入当地时间进行记述;下限止于各卷付梓的时间,不作统一规定。
- 五、《大典》寺院条目的排序,除全国重点寺院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惯例排序外,其余均按既定的行政区划顺序排序。在同一地区的寺院,仍按惯例排序。
- 六、《大典》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凡立传的大德高僧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在相关寺院条目中;在世人物重要事迹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于相关寺院条目中。
- 七、《大典》中“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以各地宣布正式解放时间为界;“文革”,指1966~1976年期间。
- 八、《大典》纪年方法,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九、《大典》中的地名、路名,凡可用现地名、路名表述的,均用现在的地名、路名;必须使用旧地名、路名时,均括注现地名、路名;因一时难以查考的,仍沿用原地名、路名。
- 十、《大典》资料主要来源于方志、档案、图书、报章、杂志、历史文献、口碑资料和个人提供的材料。
- 十一、鉴于地区情况各不相同,《大典》各卷编纂过程中,在坚持统一体例要求的同时,允许内容按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但须符合凡例的基本要求。

序

肖武男¹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²。2500多年前，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由古印度伟大的圣者、迦毗罗王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2000多年前，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³，佛教随着绵绵不绝的商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汉族地区，藏族、蒙古族地区和傣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三大系统，组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生生不息的中国佛教。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桩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从此，这种外来的新兴的异质文化，不但打破、解构了大汉帝国“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格局，而且在与儒学、道教的长期彼此冲突、相互融合中，终于东晋时期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由此重构了儒、释、道鼎足而三的气势阔阔的中国古代文化，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精神的恢弘大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其诸子辩说的汪洋恣肆，百家思想的流脉纷呈，构成被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的“轴心时代”⁴。其中，儒家的醇厚、墨家的谨严、道家的超逸、法家的冷峻、阴阳家的流转、名家的思辨、兵家的智慧……以及诸子百家的“和而不同”，在中国历史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至今仍令人陶醉、给后世以享用不尽的、丰厚的文化遗产。

¹ 肖武男：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鉴真佛学院荣誉院长、以色列海法大学董事局执行董事、韩国东国（佛教）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北京大学当代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² 世界三大宗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³ 《三国志·魏书·释老志》：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范曄《后汉书》则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⁴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人的历史》中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人竭力想规划和控制事件的发展，第一次想恢复或创立一些称心的条件。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最好地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0页。



秦政一统天下，焚书坑儒，独尊法家，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用兵边陲，民怨鼎沸，遂使天下大乱，二世而亡。汉朝初年，文、景二帝以黄老治国，适应了人民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顺应了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但是，由儒术而成经学，而成谶纬，又使大汉帝国沉浸在天人感应、谶言纬书盛行的神秘主义氛围之中。特别是自东汉桓、灵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⁵；加之天灾不断，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黄巾大起义，又在豪强地主的血腥镇压下，归于失败。在这种境遇下，痛感人生悲苦，渴望安宁生活，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于是，以追求人生解脱为旨归的佛教，一改过去若隐若现、面目朦胧，突发性地大举涌进中国，成为古老中国的“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⁶。据初步统计，从桓、灵二帝到曹魏的百余年间，尽管动乱不已，战争连年，但仅译介的佛经，就有100多种。建安七子中的孔融，曹氏集团中的曹植，都受过佛教的熏陶。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魏晋玄学，实为中国传统老庄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相互激荡的丰硕成果。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扩展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是一个佛光流照的时代。究其原因，除了儒术的继续衰落和玄学的兴盛之外，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是其重要的政治推动力量。所谓北朝的“五胡”，都是佛教的信奉者和扶植者。石赵是羯人国家，奉西域僧佛图澄为国师，出家者众；氐人国家前秦苻坚攻陷襄阳，取名僧道安莅临长安供奉；羌人国家后秦姚兴迎请龟兹僧鸠摩罗什，组织了第一个国家译场；匈奴人国家北凉沮渠蒙逊则在武威天梯山造像，推崇天竺僧昙无讖；逮至鲜卑人的北魏国家统一北方，佛教更是被抬到了近乎国教的崇高地位。于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倡导下，佛教迅速向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中传播，江淮以北，仅是僧尼二众，就达到200万。著名的麦积山、云冈和龙门石窟，都建造在这个时期；规模宏大的寺院和富丽华贵的金铜铸像，也均以北朝为最。为了加强对迅速崛起的僧团的管理，北朝还建立了僧官制度，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此同时，南朝统治者亦将佛教作为一种国家事业和统治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佛教发展。在注重深究佛教义理的同时，也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因而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⁷的繁盛景象。特别是梁武帝萧衍（420～589年）笃信佛法，奉佛教为国教，他不仅广造寺院，而且四度舍身同泰寺，并亲自为僧俗四众讲解《涅槃经》。其流风所及，上自帝王宗室、世家大族，下至庶民百姓，都崇信佛教。这一时期，译经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不但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些经卷承载的佛学思想，深邃而纷杂，说理富于逻辑，寓言多蕴哲理，而神话传说则丰伟奇幻，洋溢着人类精神世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佛教东传所带来的这一切，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新知识、新思维，它不但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对构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启迪与开拓作用。

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社会动乱和南北对峙，国家重新归于统一，多民族趋向空前的大融合，古代中国步入了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佛教作为这一隆盛时代的反映和表现之一，

⁵ 《后汉书·朱穆传》。

⁶ 「荷」许理合著，李思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⁷ 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便是诸种宗派的纷然兢立，各呈奇态。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宗、净土、律宗、密宗八大宗派并行不悖，促使佛教向多元化、多层次方面发展，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创立这些宗派的中外佛教大师及其传人⁸不仅得到了朝廷的优渥礼遇，而且在士人和广大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中，慧能的南宗禅，一花五叶，流播天下；而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传法，更是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异彩华章。

与韩愈、柳宗元等所鼓动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并流，中唐以后，还有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士大夫狂热礼赞南宗禅，形成了风靡士林的禅悦之风。南宗禅吸引士大夫的魅力，不仅是它那莲花万朵，无生无死，悠哉游哉的彼岸世界，而且还有它所特具的在“悟”中求得自我心理平衡的功能。其绝妙之处，“在于它把人的情欲导向内向反省，使情欲转化为人生情操的自我修养动力，从而平息了向外追求的躁动”⁹。白居易对此深有感悟，他说：只有参透“南宗心要”，便可“颓然自足”，“抚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¹⁰。吕温亦说：佛教“极力以持其善心，专念以夺其浮想”，能够使人“心无所念，念无所求”¹¹。

逮至宋代，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佛教传入中国后，即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随着六朝佛教义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而形成“中国佛教”，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学”，却是以佛教衰落后的士大夫佛学为代表的。由僧团佛教转向士大夫佛学，由侧重以信仰为特征的宗教性的佛学研究转向侧重以理性为特征的学术性质的佛学研究，以学者的态度去研究佛教并有所创造和发挥，这是此前中国佛教所少有的现象，也是宋代佛教的重要特色和贡献。其巨大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则是两宋诸子“援佛入儒”，对孔孟传统加以改造，从而建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学理论体系。其巨大影响所及，甚至带动了中国道教的革新，盛行于金元时代的全真道，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汲取佛教、特别是南宗禅的思想营养，对传统道教进行改造的产物。

总之，佛教东传，为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¹²。

⁸ 佛教八大宗派的创立者，除天台宗智顗外，其他都不是汉人。三论宗的吉藏是安息裔，故称胡吉藏。华严宗的法藏是康居裔，故称康藏国师。唯识宗的两个宗派，慈恩宗的窥基，属鲜卑族尉迟部；新罗系的圆测，则是新罗人。密宗的开元三大师，善无畏、金剛智是天竺人，不空是师子国人。

⁹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

¹⁰ 白居易：《答户部崔侍郎书》。

¹¹ 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全唐文》卷六百三十。

¹² 吴学明：《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在松赞干布执政的吐蕃王朝时期，即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通过赤尊公主、文成公主把大量的佛经、佛像、法器从尼泊尔、汉地带到了吐蕃。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迎请一些印度、尼泊尔、汉地僧人进入西藏地区传法。当时，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建立寺院，二是翻译佛经。通过修建寺院和翻译佛经，使佛教开始在吐蕃流传起来。松赞干布之后，其子赤松德赞、孙赤祖德赞也大弘佛教，恭请尼泊尔静命¹³论师、莲花生大师来藏弘法，又请静命论师、莲花生大师建立桑耶寺。此后，经过80多年的朗达磨灭佛，到北宋初期，即10世纪末，佛教又在吐蕃重新流传，并吸收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一些神祇、仪式，形成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相继产生了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几个重要宗派。明朝初年，格鲁派（黄教）异军突起，成为势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宗派。

与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同时，即7世纪中叶，南传佛教也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地区，后逐渐形成润派、摆庄派、多列批、左抵派四个派别，为云南傣族、布朗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所信仰，对这些民族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宗教活动的场所称为寺院。它既是佛教供奉佛菩萨的场所，也是出家僧众居住、修行和举行各种法事活动的地方，同时还是佛教信众心中向往、届时朝拜的圣地。佛教寺院的兴废，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盛衰，而且参证着社会的治乱。佛教寺院作为佛教的外在要素和佛教文化的主要依托，成为人们了解佛教、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汉时期，汉地佛教寺院主要是按官署布局建造，其格局总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相似。院落重叠，层层递进，回廊相绕，引人入胜。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佛教寺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石窟寺，北魏至唐代，相继开凿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供奉石刻佛像，绘制精美壁画，并在石窟周围建造寺院。另一种是塔寺，亦称浮图寺，以塔为中心，周围建造殿堂、僧舍，塔中供奉舍利、佛像等。“天下名山僧占多”。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僧人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建造了众多寺院。

两宋时期，南宗禅兴盛，形成了“伽蓝七堂”制度¹⁴。规模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禅堂、经堂、塔、钟鼓楼等。建于山上的寺院，也依此模式。

明清以降，汉地佛教寺院建筑格局已成定式。每座寺院，一般是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法堂、藏经楼、毗卢阁、观音殿。大雄宝殿是寺院的主体建筑，东西两侧的配殿为钟楼与鼓楼。伽蓝殿与祖师堂，观音殿与药师殿相对应。规模大的寺院，还有五百罗汉堂、

¹³ 也有人译为寂护。

¹⁴ 七堂，指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

佛塔等建筑。中轴线东侧分布僧房、香积厨、斋堂、职事堂等，是寺内僧人的起居生活区；中轴线西侧主要是禅堂、接待室等，为前来挂单僧人修行之所。

藏传佛教寺院是重大宗教活动、政治活动的场所。藏传佛教寺院，一般由札仓（经学院）、拉康（佛寺）、囊欠（活佛公署）、印经院、藏经楼、灵塔殿、僧舍等组成。札仓为经学院，是僧侣学习、修行的场所。各札仓都建有佛殿、经堂、后殿、辩经场、活佛公署、大厨房、僧舍等，自成体系。藏传佛教的殿堂，规模宏伟，金碧辉煌。札仓为主要殿堂，有的大殿堂，可容纳数千名僧侣同时念经和举行法会。殿堂内，挂满幢幡、围幔、经布，有的寺院还有刺绣、堆绣、壁画等，把整个殿堂装饰得富丽堂皇。殿堂建筑风格，以藏式为主，同时吸收汉式、印式建筑风格，使藏传佛教建筑更具特色。灵塔殿主要供奉历世达赖、班禅，是以黄金、白银制成，上面镶以各种珠宝，精美绝伦。如布达拉宫有八座灵塔殿，供奉着八位达赖、班禅的灵塔。其中，五世达赖的灵塔高 14.85 米，用纯金 3 724 千克，并镶嵌各种珍宝 1.5 万颗，堪称稀世国宝。

上座部佛教寺院，主要由佛殿、藏经室、僧舍及佛塔组成。佛殿是佛寺的主要建筑，内设佛座（上供释迦牟尼像）、经书台、僧座，是僧侣日常念经、从事各种佛事活动的场所。藏经室用于收藏寺内各种佛教经典，僧舍则是僧侣学习和居住的地方。佛塔是云南上座部佛教最具特色的建筑，有缅甸钟形佛塔、亭阁石佛塔、泰式金刚座佛塔、高基座佛塔、八角形密檐式佛塔等，是寺院规格高低的重要标志。

汉地佛教寺院的布局如下：

山门殿，又称三门殿，为寺院的大门。一般开三个门，象征佛教“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手执金刚杵，守护山门。

天王殿，又称弥勒殿，为寺内第一重殿。殿正中供奉弥勒佛像，东西两侧分塑四大天王像。弥勒佛像背后，是寺院守护神韦陀像，手持金刚杵，面对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又称正殿，大殿，是寺内的主体建筑，高大雄伟，气势非凡。大殿正中供奉佛教至高无上的本尊释迦牟尼佛像，有供奉一尊、三尊、五尊三种形式。供奉一尊释迦牟尼像的，其形状有结跏趺坐和站立两种姿势，两侧立有迦叶、阿难两位弟子¹⁵。供奉三尊佛像的，称三身佛或三世佛。正中是法身佛，名“毗卢遮那佛”，表示绝对真理，就是佛本身；左侧是报身佛，名“卢舍那佛”，指通过修习而证悟绝对真理，求得佛果之身；右侧是应身佛，名“释迦牟尼佛”，表示随缘教化各种众生的佛身。三世佛有两种：一是释迦牟尼佛居中，代表当今世界；药师佛居左，代表东方净琉璃世界；阿弥陀佛居右，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另一种是体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释迦牟尼佛、迦叶佛和弥勒佛塑像。释迦牟尼佛居中，代表现在；迦叶佛居左，代表过去；弥勒佛居右，代表未来。宋代佛教寺院，其大殿常供奉五尊佛像，称五方佛。正中是法身佛，名“毗卢遮那佛”；左侧第一位是南方宝生佛，表示福德，第二位是东方阿閼佛，表示觉性；右侧第一位是西方阿弥陀佛，表示智慧，

¹⁵ 有的佛教寺院，大殿内只供奉一尊毗卢佛，其莲座为千叶莲花，代表整个华藏世界。在净土宗寺院的大雄宝殿内，供奉的是阿弥陀佛立像，作接引众生状，又称接引佛。



第二位是北方不空成就佛，表示事业。大雄宝殿两侧，多供奉十八罗汉像。五代以前，多供奉十六罗汉；宋元以后，多供奉十八罗汉；明清时期，有的寺院供奉的罗汉多至五百。

大殿正中佛像背后，是海岛观音像。观音两侧是善财童子和龙女。观音造像最为丰富多彩。有一首两臂、结跏趺坐的圣观音像，有一足盘膝、一足下垂的自在观音像，有千手千眼观音像，还有四十八臂观音像，造型别致，生动有趣。

法堂，亦称讲堂，是佛教寺院中宣讲佛法、皈戒集会的地方，其建筑规模仅次于大雄宝殿。法堂也供奉一些佛像，但堂中设法座，又称“狮子座”，供名僧大德宣讲佛法。座前有讲台、香案，两侧列置听法席。堂内，钟鼓齐备，开讲时，钟鼓齐鸣。

藏经楼，又称藏经阁，是佛寺珍藏佛像经籍之所，一般安置在中轴线最后一进，为两层楼房。下层为千佛阁，正中供奉毗卢那佛，沿壁塑小佛龕，供奉上千座小佛像，沿壁置立柜，安置藏经。楼上主要是贮藏经书。

此外，还有固定的庄严和供具。庄严有宝盖、幢、幡、欢门等，供具有香炉、花瓶、烛台、香水、鲜花、香烛等。

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供奉的佛像，与汉地佛教寺院大致相同。但在佛像塑造风格上，则吸收了本地文化特点，各有特色。藏传佛教还吸收苯教的一些神祇，普遍供奉度母、金刚、宗喀巴等神像，塑造风格、表现手法更加粗狂流畅。

汉地佛教寺院有一套严格的丛林制度。方丈（住持）主管全寺事务，下设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四大班首为首座、西堂、后堂和堂主。首座为全寺修行的模范，掌握堂中号令之权，由住持聘请名僧大德担任。西堂是指西堂首座，辅助住持教导僧人修行。后堂是指后堂首座，负责后堂修行事务。堂主在首座之下，负责禅堂、念佛堂事务。八大执事指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典座、寮元、衣钵、书记。监院辅助方丈管理全寺事务，掌管全寺经济。知客为客堂负责人，掌握全寺接待事宜。僧值又称纠察，管理僧众威仪。维那为殿堂负责人，掌管仪式法则。典座是厨房、斋堂负责人，管理僧众伙食及信徒供斋等事务。寮元是云水堂负责人，管理来寺挂单僧侣事务。衣钵是方丈室负责人，帮助住持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书记掌管寺内文书往来之事。八大执事，每年一任，由住持任命。

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的僧人是智果，又称古学，即“呼图克图”，是寺院内具有崇高地位的活佛。他们的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掌管全寺事务的僧人称“赤巴”（住持），由戒行高深、经典娴熟的僧人担任，三、五年一任。大寺院中札仓的主持人和小寺院的住持，称为“堪布”。堪布之下，有格果、翁则、雄来巴、接巴、根察、根巴、涅巴等职。格果，即铁棒喇嘛，负责督察喇嘛纪律，维持寺院规章制度；翁则，又称掌经喇嘛，负责领众诵经及解释经典；雄来巴，管理学习经典；接巴，即法神喇嘛，负责决疑卜筮之责；根察，统管全寺事务，监察全寺出纳；根巴，称管家喇嘛，掌管寺内财产及收支事宜；涅巴，又称充本喇嘛，负责管理贸易。

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统管全州佛事活动的寺院称总佛寺，其住持祜巴勐为全州最高僧领；第二级，是州属各勐的勐级总佛寺，负责全勐佛教活动；第三级，是行政区

级佛寺，为全陇中心佛寺，统管下属几个村寨的佛事活动；第四级，是村寨佛寺。同时，僧人教阶也分为八个等级：第一级，帕，即和尚，正式出家，亦称沙弥；第二级，都，即比丘，俗称佛爷，晋升为都后，才有资格担任寺院住持；第三级，拈巴，意为师傅，需有较高的佛学修养，晋升以后，一般不能还俗，被称作都统长老；第四级，沙密，即沙门统长老；第五级，僧伽罗阇，为僧主长老；第六级，帕召拈，为阐教长老；第七级，松迪，意为僧正长老；第八级，松迪阿保罗尼，意为大僧正长老。

佛教寺院的宗教活动，主要有僧尼的日常行事、忏法、法会等。

佛教寺院规定，僧人每天要做“五堂功课”，上“两遍殿”。每天凌晨（约4时），钟声破晓，僧人就要起床上殿诵经。一般早殿有两功课，念诵《楞严咒》为一课，念诵《大悲咒》、《十小咒》为一课。藏传佛教寺院晚殿，约在下午三时开始。僧人在暮鼓声中，云集殿堂，念诵《阿弥陀经》和佛名，做三堂功课。僧人在早餐、午餐时，须依《二时临斋仪》，进行过斋。

忏法是佛教徒自我修行的重要方法，通过念经拜佛，忏悔以往所犯罪孽，发愿今后精进修行。忏法有忏悔罪过和修习止观两类。汉地佛教中，禅宗和净土宗都有“打七”仪式。禅宗“打七”称“打禅七”，净土宗“打七”称“打净七”。

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是佛教寺院一种隆重的佛事活动。佛事时间，从几天到几十天不等；参加法事的僧人，从几十人到几百人，规模盛大。此外，汉地佛教举行的传戒法会、藏传佛教举行的活佛转世和传召法会、云南上座部佛教举行的升和尚仪式、赕佛等，都是重要的佛事活动。

佛教最重要的节日，是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纪念日。届时，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寺院都要举行法会，以示庆祝。汉地佛教寺院，还有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传统。藏传佛教寺院传统的法会是传召法会，又分为传大召、传小召两种。传大召是从藏历正月初三至正月二十，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大祈愿法会，进行讲经、辩经活动。传小召在藏历二月举行，为期十天。法会期间，拉萨三大寺僧侣在大昭寺进行辩经等活动，选拔二等格西。云南上座部佛教有泼水节、雨安居、关门节、开门节、献经节、豪干节等。节日期间，举行礼佛、献经、诵经、供僧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

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佛教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至今，佛教寺院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2000年来，佛教寺院承载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举凡建筑、造像、绘画、音乐、佛经印刷等，都对文化艺术各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建筑种类繁多，有石窟寺、殿堂、楼阁、塔等。在中国大地上，山西大同的云冈、太原的天龙山，河南洛阳的龙门，甘肃的敦煌，山东济南的千佛山，江苏南京的栖霞山，四川的大足，云南的剑川，新疆的库车、高昌等地，分布着一系列石窟寺。这些石窟的雕塑、壁画，是中国古代艺术家把传统艺术与外来佛教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创造的佛教艺术珍品，具有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寺院建筑，既是劳动人民丰富智慧和惊人创造力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宝库。汉地佛教寺院，有的寺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寺院与奇丽的自然景观相依，为大好河山增辉添色；有的寺院采用江南园林式建筑模式，寺院与林木花草相